

城市治理
与
城市发展
经典译丛

丛书主编
何艳玲

城市政治学
理论前沿
(第二版)

Theories of Urban Politics, 2E

Jonathan S. Davies
David L. Imbroscio

[英] 乔纳森·S·戴维斯
[美] 戴维·L·英布罗肖
主编

何艳玲译

治理
发展
译丛

丛书主编
何艳玲

Jonathan S. Davies

David L. Imbroscio

[英] 乔纳森·S. 戴维斯

[美] 戴维·L. 英布罗肖

主编

何艳玲译

Theoria of Urban Politics, 2E

城市政治学

理论前沿
(第二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政治学理论前沿:第2版/(英)戴维斯
(Davies, J. S.),(美)英布罗肖(Imbroscio, D. L.)主编;
何艳玲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经典译丛)

ISBN 978-7-5432-2306-6

I. ①城… II. ①戴… ②英… ③何… III. ①城市学-
政治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253 号

责任编辑 顾悦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经典译丛
城市政治学理论前沿(第二版)
[英]戴维斯, [美]戴维·L. 英布罗肖 主编
何艳玲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www.hibooks.cn
www.ewen.cc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3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22.25
插页 1
字数 243,000
版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2306-6/D·69
定价 52.00 元

总序

迈向中国城市善治

毋庸置疑，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

当下，中国正处于越来越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逐渐成为转型中国资源和问题集中之地。土地资源、环境资源、城市公用设施，这些对城市而言非常重要的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并开始形成各种社会冲突和风险。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未来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大部分将是城市问题。城市如何实现善治，亦即“更少的损耗，更美的服务”，对每个国家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对中国也是如此。

从学科研究来看，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城市研究历史由来已久，成果丰硕，城市研究是一门融合了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规划学和地理学的显学。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相关研究也在逐渐升温，但总体来说，城市研究，尤其是从政治与治理角度对城市问题的探讨，仍然是一个有待给予更多关注的领域。尤其是，中国的城市专门研究似乎主要由地理学者或城市规划学者来完成，而政治学与行政学者却较少涉及，这不仅制约了中国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发展，也制约了中国城市研究的纵深拓展，更制约了我们对各类城市改革计划的理解与设计。

为了推动学科起步，并更好地回应中国问题，我们必须大规模引进和借鉴国外城市研究经典与前沿理论，以更好地了解研究动态，熟悉和

掌握其研究方法;进而开展高质量的研究,以中国大国转型经验为基础,与国际学术界占据主流但主要是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展开平等的学术对话。有鉴于此,得益于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格致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组织编辑了“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经典译丛”。译丛精选了数本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领域的上乘佳作,内容涵盖城市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社会、城市公共政策、城市规划等领域,其共同特点是选题精确、论述精妙、观点精彩、引人深思。

在传统上,城市研究有三个经典问题,即谁使用了城市权力,城市治理的性质,市民如何影响这些权力和治理以及如何被这些权力和治理所影响。可以说,从政治与治理角度来看,城市研究的关键词是权力、治理和市民。本译丛所选择的书都贯穿并回应了与这三个关键词相关的城市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无疑也是中国城市走向善治的关键环节。事实上,如同国外城市发展所经历的一样,促成城市善治的中国城市研究也必须回答如下问题:城市决策过程是怎样的?这一决策过程的参加者是谁?是哪些因素在影响他们各自在城市权力分配中的地位?哪些是中国城市中的重要决策议题?全球化以及城市政府主动推进的城市化对于城市政治与治理过程有没有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什么?城市权力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与分配,这种分配对城市不同社会群体有什么影响?城市中是否存在城市治理所指向的网络?城市政治与治理过程有没有冲突?这些冲突如何得以解决并达成共同行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更多具有问题意识的研究者来参与,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大量扎实的实证研究,建构本土解释,并与国外有关研究展开有质量的对话。我们期待这套丛书的出版,能让城市研究者、城市管理实践者以及有关专业的学生从中受益,并为促进政治与治理框架下的中国城市研究作出贡献。

中山大学夏书章教授是中国行政学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市政学创始人之一。延续他所创立的学科根基,呼应当前中国实际,中山大学已将城市治理研究确定为未来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扎根真实世界,回应中国问题,建构本土理论,参与国际对话”,这是中山大学全

体政治学与行政学人秉承的宗旨。我们衷心希望能够继续坚持这一宗旨,继续依托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继续依靠国内外所有同仁的帮助与支持,竭尽全力在城市政治与城市治理研究领域搭建对话平台,促成学术共同体,构建一个属于全体学人的温暖家园!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everal stylized, connected characters. The signature is positioned to the right of the main text block.

译者序

从本书第一版出版(1995年)到第二版出版(2009年)期间,城市政治学经历了新的发展,成为一门更为成熟、理论体系更强的学科。在此期间,治理理论发展成为城市政治学的主流话语体系,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步伐远远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后现代主义的滥觞和地方治理的碎片化也使得城市政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作为一种次国家空间,城市已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与全球化、区域化、社区治理的兴起和扩散浑然交织,城市系统的网络也变得纷繁复杂。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城市的危机也潜伏在发展的背后,如贫穷、种族问题、性自由泛滥、文化冲突、空间争夺、城市运动等,皆以不同方式困扰着城市治理者。城市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在市民、政府官员和研究者的自我感知中,城市的内涵已远远超出单纯的生产生活空间。城市可以是网络建构的,也可以是存在于文化意象中的。城市既可以是实体的城市,也可以是观念中的城市。城市既可以是由权力和制度联结与塑造的,也可以是碎片化的。城市空间既可以是物理的,也可以是政治和社会的。

当前,城市的景观与形态更是五彩斑斓。从意识形态到权力结构,从理念到实践,从理论到方法,在本书第一版出版至第二版问世期间,城市政治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诚然,关于城市这一复杂多元体政治与治理过程的研究前沿,要回答的问题实在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回到城市政治学的原点,权力结构、治理过程和城市居民对权力结

构与治理过程的反作用力依旧是城市政治学中最重要、最经典的主题，几乎所有城市政治景观的变化和研究成果的演进，都与这三者密不可分。

城市政治权力的结构安排

在本书的第一版中，第1章就对城市权力有所着墨，探讨最多的是多元主义、精英理论、增长机器和机制理论。艾伦·哈丁(Alan Harding)当时探讨的是精英理论与增长机器理论。在本书的第二版中，仍会提到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之争的历史轨迹，以及经典的纽黑文案例。最大的变化则是，地方治理理论的强势兴起正在挑战机制理论的地位，成为最大的显学。

关于城市政治权力结构安排的第一个问题是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之争。在本书的第一版中，已对精英—多元主义之争有过详细的阐述。传统城市权力结构研究有两大流派：一是以亨特(Hunter)为代表的精英论，二是以达尔(Dahl)为代表的多元论。精英论与多元论的争辩，奠定了此后城市权力结构研究的基本范式。在本书中，艾伦·哈丁仍以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区权力争论为起点，探讨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之争的胶着与演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权力结构的争论一直被精英论与多元论所垄断。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超越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之辩的权力结构模型。这其中包括增长联盟(或增长机器)理论、城市机制理论、地方治理理论等。增长联盟理论通过经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回到了亨特所关注的大主题上：商界积极分子主导了塑造地方决策的程度。增长机器指的是拥护“价值中立的发展”这样一种具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的、政党之外的地方利益联盟，是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论证超地方(supra-local)的商业决策和行为在塑造地方商界利益倡导的城市发展战略方面，增长联盟理论比早期精英理论和多元主义理论都要走得更远。在论证为什么地方政府主要关心增长方面，精英理论和多元主义

理论是比较不成功的。

作为城市政治学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克莱伦斯·斯通(Clarence N. Stone)提出的城市机制理论在过去十年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城市机制理论是分析美国地方政治的主流范式，但在其他政治语境中的适用性一直饱受各种质疑。在美国之外运用城市机制框架存在潜在的跨国适用性问题。重新定义城市机制是解决其跨国适用性的重要手段。莫斯伯格(Mossberger)和斯托克(Stoker)提出了城市机制的四个定义标准，将城市机制定义为“基于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合作”，这是推进城市机制理论普适性的重要理论贡献。斯通本人对机制进行了重新定义，“公民生产力”的概念被运用到管理特定问题的子系统上。但他仍然坚持主张，合作集中于一个特定议程，并基于一系列特定的参与者、资源和合作方式。此外，一些美国学者同样对城市机制理论颇有微词，指出机制议程分配和社会问题优先排序的问题。城市机制理论在欧洲和北美均遇到了挑战。

治理理论的崛起可以说是过去十年城市政治学发展中的最大亮点，地方治理理论基本上支配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城市的政策修辞和城市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在美国，治理理论的影响力或许仍不及城市机制理论，但治理网络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已不容忽视。作为大西洋两岸的主导性权力结构理论，治理理论和城市机制理论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例如对非正式的公私合作和正式政府制度外因素的关注，以及对需要动员资源以获得行动所需要能力的认可。治理缺乏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但正是这种缺陷赋予了治理灵活性，使其普适性远远超越了机制分析框架。机制理论过度依赖特定的情况和美国的大背景，显示出适用性上的不足。

斯通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提到要超越精英冲突和联盟，强调“政治秩序”的概念。他指出，政治秩序的概念虽然不够完备，但它能够将分析的视野拓宽到精英层面的冲突和联盟的建设以外。政治秩序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角度去审视政治，因为政治秩序并不着眼于是谁在管制，而是着眼于管制是如何发生的和管制过程本身。政治秩序还

很好地符合了“机制为中心”方法的概念,避免了将社会经济过程置于首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与公民社会、经济是互相分离的。因此,政治秩序的概念考虑了将政治和社会分层体系编织在一起的多股力量。关于“政治秩序”概念框架在城市政治学研究中的影响力和应用性,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城市领导力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较为盛行。史蒂芬·格里斯利(Stephen Greasley)和斯托克对英国的城市政治领导力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本书中,城市领导力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民选市长体制的效能。民主政体面临着普遍性的合法性危机,公民参与政府正式问责的机会在大幅减少,左—右对立和对政党忠诚的政治文化逐渐式微和转变。治理的制度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地方政府要管理和协调组织网络,以实现提供福利国家的传统服务和重建议程的双重目标。整个欧洲都在兴起采用地方政府直选市长制度或其他方式以增强城市首席执行官政治领导力的运动。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有力的理论或实证研究能够证明民选市长制度能够挽救城市日益式微的领导力。此外,增强领导力是否为处理地方民主问题最好的方法,也是一些学者正在探讨的问题。

治理的过程与性质

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治理”并未被列为一个单独的主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只是在“城市政府与民主”的章节中有所涉及。“城市政府与民主”的章节谈到了官僚与城市政治的问题,城市政治中政治领导的问题,规模、效率和民主的问题,以及地方政府机构与民主治理的问题。可见第一版的重点是放在城市民主方面,治理只是论述中的“附属品”。

对“治理”一词尚未有一个普遍性的定义。洛德·罗德斯(Rod Rhodes)等治理理论家青睐仅仅涉及组织内部网络的狭义定义。“治理”的广义定义之所以被使用,在于其涵盖了很多不同的内容和观念。一谈到“治理”,我们往往会将其与网络、伙伴关系等联系起来。治理是

和网络的兴起、组织边界的模糊化相联系的。治理理论的框架既涉及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亦涵盖区域治理和城市治理。在城市政治学的视域中,区域治理与城市治理(或者是地方治理)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城市学者运用了四种主要的理论框架来研究大都市与区域治理问题,包括大都市政府、公共选择、新区域主义以及地域重划与再区域化等四种区域主义范式。新区域主义于20世纪90年代获得较大的发展。新区域主义者很少强调结构性改革,而是将城郊之间持续存在的发展差距问题摆在首位。地域重划(或再区域化)为解释新区域主义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内涵。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城市区域被理解为更广泛的国家领土和新国家空间重构中的一部分。

在治理理论的实践中,英国的新工党提出了“协作性政府”(joined-up government)概念。协作性政府是一种战略,其寻求政府部门与代理机构以及一系列个人和志愿者的团结,使他们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跨越组织界限一起工作。公私伙伴关系是协作性政府的一种形式,指的是公共部门、企业和/或公民社会中两个或以上成员的战略联盟。对伙伴关系而言,自愿、互惠与互利是非常重要的。新工党将多元代理伙伴关系视为实现协作性政府和地方复兴的关键工具。

伙伴制是“为重整一个特定区域而制定和监督一个共同的战略所结成的利益联盟”。最初,伙伴制在重振城市计划中被英国保守党政府当作一种手段来重构公共和私营经济的界限;后来,这一概念被逐渐运用到重振城市政策之外的其他政策领域。作为一种“利益联盟”,伙伴制一般具有四个维度:中央政府与城市政府的伙伴关系;城市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城市政府与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城市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伙伴关系。可以肯定的是,治理、网络、伙伴制越来越成为流行语言;而且,治理在实践中也发挥了成效。伙伴制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概念,因为它分散了成败的责任,并保证相对低一级的公共开支能被用来调节大量的私人投资。

另外,当我们谈到治理的时候,也会自然地联想到制度主义学派。

有学者认为,治理理论是以制度学派为基础的,因为治理是关于政治行动者影响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标准及行为模式的方式。城市政治科学家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抛弃了早期的制度主义。但是,新制度主义经过变革,获得了一些学者的重新认可。新制度主义至少在三个重要方面不同于旧的制度主义理论:首先,它关心的不仅是正式的规则和结构,还关心塑造政治行为的非正式的联盟公约。其次,它不太看重政治制度本身;相反,它以批判的视角来看待政治制度体现的价值与权力关系。最后,新制度主义反对早期研究方法中的决定主义。随着城市治理的碎片化,新制度主义者恰巧处于重新绘制“游戏规则”和塑造地方政治行动者行为方式的位置上。对我们而言,新制度主义框架是特别合适的,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工具:城市政治与治理的首要规则;城市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城市政治与治理变化的争议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新制度主义对于城市治理的实践依然具有相当强的指导意义。

城市居民如何影响权力结构和治理过程

如果说上述两点是从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去观察和解释城市政治的话,那么这一点则是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去深化理解城市政治的性质和过程。本书的第一版对种族、性别等问题也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在本书的第二版中,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本书的第一版主要围绕“公民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第二版中,这个问题已较为淡化,只有在谈及种族问题和“身份政治”时才会有所涉及。但城市社会运动由于受到全球化议题扩大化的影响,因此在第二版中就城市社会运动的问题继续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城市性别方面,第一版主要研究了女性与城市政治的问题,第二版中则将性别研究上升到了城市性别系统上,涵盖了酷儿理论、女权主义、同性恋和性别政治解构与重构的问题。社会排斥和社会资本都是本书第二版新呈现的内容。

马拉·悉尼(Mara S. Sidney)对贫穷、不平等与社会排斥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其在过往的政治学视角和经济学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视角。达尔的多元主义理论和机制理论等政治学视角的学说在看待贫困人口问题上较为乐观,这与精英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经济学视角的学说的悲观论调形成了一定的对比。20世纪90年代,社会排斥的概念在欧洲城市政策和城市研究中处于支配地位。这种研究城市政治学的方法的内在逻辑就是以问题为中心。它促使“城市的问题”或者是“某部分人的问题”得以概念化。尽管社会排斥的概念不稳定且富有争议,但是欧盟、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都已经把这个概念用于发展和证明一系列关于社会福利政策,以及与就业、教育、住房和其他社会公共服务有关的城市计划。几种研究贫困问题的理论视角在非营利组织的中心性、政策还是过程、观念和话语的作用以及地方规模的限制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分歧。

种族是城市政治中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本书第二版也收录了J. 菲利普·汤姆森(J. Phillip Thomson)一篇关于种族和城市政治理论的文章。在美国,一些基础的种族老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比如社会生活中深层的种族分化、经济体系上对黑人穷人的排斥和国家压制等问题。美国种族的版图在迅速改变。近年来,拉美族裔的人口超过了非洲裔美国人。可以想象,创设给非白人、低收入主体和次主体在多数城市或国家的机会空间,以及在公共政策参与上的灵活性,将是吸引黑人和拉美人积极参与政治选举的引诱剂。美英两国之间在种族问题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在政治结构、历史和民主层面上都有不同,但在一些领域,种族问题的跨国对比研究可能对两国都有用,例如如何化解根植于资本主义、奴隶制、隔离制度和殖民主义的阶级和种族政治矛盾等,如何处理由少数族群在居住上的隔离、高失业率、低受教育率、社会排斥、高犯罪率以及对于政策和公共权威高度的不信任引起的紧张局面。少数族群的民权问题是尚未完成的革命。

朱迪思·加伯(Judith A. Garber)则探讨了城市性别系统的问题。如何最好地描述社会性别系统的特征是城市学者争论的一个主题。一

些社会性别经验问题持续吸引人们对城市妇女和男同性恋的关注。对男同性恋的存在,以及对因各种社会、政治和性的原因结合而成的城市空间的兴趣,将各个时代的研究者联系了起来。性和种族、阶级、年龄的重叠意味着,即使是在同样的城市、同一同性恋区域,甚至是在像同性恋游行和抗议这样的同一事件里,也并不是所有的男同性恋者都占据同样的空间。对女权主义者而言,研究中并没有某个单一问题处于支配地位。城市当局要考虑到妇女的就业机会、婚姻地位、儿童(或父母)看护的便利性、住房歧视等问题。女权主义者和酷儿理论者对城市政治空间和空间政治的问题进行了许多有益的讨论。

城市社会运动则是城市居民对权力结构和治理过程重塑的最集中体现。城市社会运动的概念不断扩大,并囊括了一些不甚激进的社会运动。城市社会运动的新议题不断出现。应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的影响,研究者开始扩大他们的视角,把国家和地区行动者也作为社会运动图景的一部分。城市社会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也是行动主义发展新浪潮的一部分。城市运动的参与者关注生活质量问题以及政府如何推动更直接的公民参与等。这些新社会运动有时也被称作“身份政治”。研究者分析城市社会运动最主要的理论有资源动员理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和框架理论。城市社会运动提出议题影响地方居民,而移民、种族、民族、等级、性别和性取向继续有助于城市的多元化并使我们认同这些议题,也有助于成为城市社区的重要因素。另外,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代,探讨全球化议题、资源和策略的影响对理解城市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全球化进程和政策业已经经常性直接地导致地区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恶化,如城市经济和税收的损坏、失业的增加和地区服务、税收的不公平分配以及环境的恶化。为了回应这些问题,地区和国家的动员业已出现,比如环保组织对环境正义问题的回应。

城市的权力结构、治理过程和居民就是在合作和冲突中不断地互相形塑。海伦·沙利文(Helen Sullivan)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理论的发展进行了综述。社会资本已经快速而广泛地渗透到学术界和公共政策循环系统中。社会资本可以被称为一种资源,这种资源是通过行动

者间的规则互动而产生的,这些行动者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相互间具有良好的关系,他们可以利用社会资本获取个人或团体利益。社会资本把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到了网络、共同价值以及通过信任形成的社会互惠规则上,从而产生和维持社会秩序。它确定了各类关系在分析治理过程中的贡献,同时要求提供相关的结构和行为方法。在当代,这些研究者中最杰出的莫过于来自欧洲的学者,比如布迪厄(Bourdieu),还有一些来自美国的学者,尤其是科尔曼(Coleman)和帕特南(Putnam);还包括一些来自其他地方的学者,比如贝克(Becker)和劳里(Lawrie)。

城市政治学的“新鲜思维”

在本书第一版中,皮克万斯(Pickvance)批判性地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

大多数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政治学的讨论都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即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的黄金时代,和一系列由亨利·勒菲弗尔(Henry Lefebvre)、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和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撰写的经典著作。在皮克万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批判之时,卡斯特尔斯已经从马克思主义转入韦伯式社会学,但此时,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现了或者即将出现。埃德·索雅(Ed Soja)的著作试图勾勒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轮廓,或者说是马克思后现代化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同样也激发了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对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和西欧的城市新左派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了当前背景下北方世界和南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城市政治学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者最初关注的重点是欧洲和北美的城市,但发展至今,他们的城市分析越来越偏向南方世界,特别是当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霸权在南北方都表现出相似点和差异性之时。马克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为证实剥夺式积累的存在增添了有力的新观点,涉及南方世界事务的观点挑战了一些北方世界的研究视角。马克思主义城市政

治学分析遭遇了强大的挑战。然而,20世纪80年代欧洲新左派和南方世界当前出现的反抗运动显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舞台,这也证实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激进城市政治学说持续结合而并没有走向消亡。

塞雷纳·卡陶卡(Serena Kataoka)试图不把后结构主义理论纳入“后—”理论的版图,着重介绍这两部分别由曼纽尔·卡斯特尔斯和亨利·勒菲弗尔撰写的著作。勒菲弗尔对城市理论最重大的贡献在于,他声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政治”(the political)(Lefebvre, 1991)。桑德科克(Sandercock)“叛乱的敏感性”无疑比勒菲弗尔的“城市战略”更为开放,但是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的“都市漫游者”展现了对城市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更为开放的特质(Benjamin, 1983)。卡斯特尔斯和勒菲弗尔都在尽力尝试改变人们对城市和资本主义的一般认识,以此尝试探究创造城市资本主义世界表面结构的社会关系。城市不是由任何结构决定的,城市研究的内在是后结构主义的。通过归纳与总结,其给出四种体验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学科方法(disciplinary)、演进的进步观(evolutionary)、实践批判的方法(practicing critique)和场景的方法。

理查德·斯特伦(Richard Stren)研究了非西方世界中的全球化与城市问题。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非正式政治或非正式部门的复杂情况长期困扰着城市社会科学。对研究者而言,理解非政府部门政治和将非政府部门政治理论化,是多年来一个重大的挑战。联系和比较北方和南方城市的研究可能会增多。由贸易(和人员流动)形成的联系将会增多,而且由于城市政府自身的联系和跨国公司扩张所形成的关系,这种联系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从批判的视角来说,未来十年,后殖民时代的研究在人类学和地理学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可能在政治科学领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斯通在本书最后一章中,则发表了其对民主的看法。他认为,应将民主视为一个全面包容的过程,认识到选举并不是民主的充分表达,并承认在政治变化中抗议活动不是终点。民主的实质就是市场、政府和

公民社会的交叉与互动。如果市场关系的不断扩大削弱了公民社会，破坏了一个互相依赖的、能够将同一基本层面的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网路，那么民主的前景将日益黯淡。他还提倡要重新考虑多元化模式，追寻包容性，并协调平等与民主之间的矛盾。追寻包容性的核心是要认识到地方民主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奢侈品。从机制的角度来看，技术的效率包括融合公民和专家的各种建设性方法。我们要持续检查市场、减少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长期结果的关联趋势；要构建一个缺少优势的群体而不是会被疏离和边缘化的公民社会。

总之，在本书中，读者可以徜徉于城市政治的学海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城市政治理论前沿。这里有理论大师创造的极具表现力的名词，有他们演绎的一个个生动的城市故事，更少不了深谙逻辑、基于城市问题的解释话语。城市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治理是否成为城市政治的显学？城市机制理论是否式微？新制度主义是否嵌入城市政治诸多问题的解释之中？后现代主义的滥觞是否对城市政治研究造成革命性的冲击？……对于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都能在本书中找到合适的答案。

何艳玲